

《张伯驹词传》与读懂士人的秘钥

◇ 孙郁

孙郁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。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2002年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馆长。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，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。主要著作有《革命时代的士大夫——汪曾祺全集》《鲁迅忧思录》《鲁迅与周作人》等。

新文学诞生后，读书人多是沿着白话文学的路径前行，习俗与审美趣味都有些变化了。从事新文学写作的人，有许多是喜欢旧学的，或者是迷恋古代士风的，但因为趣味隐得深，人们不太谈它。像郁达夫之于旧诗，台静农精于书画之道，都不妨碍他们在新文学上的成就。或者说，他们能于白话文里有所作为，旧的艺术的影响也是有的。这类人物易被人广泛注意，但另一类人就命运不同，像张伯驹先生，被古风所染，趣味都在旧路上，与新文学是有隔膜的，后人视其遗老式的人物，道理是有的。但这一观点也妨碍了对他的认识，其实，实际的情况并非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他的世界的丰富，世间深知者甚少，那套话语方式与审美方式，有点稀世之音的味道，某种意义上说，在审美深处的情思，不亚于新文学家的文字。

张中行先生曾写过对于张伯驹印象的文章，评价的尺度偏于新，属于非士大夫的那套话语。他们在爱好上有许多接近的地方，比如同样是喜欢收藏，张中行属于藏界普通之人，远不及张伯驹博大，但张中行眼里的这位前辈，似乎少了点什么，那就是“五四”以来的某些新风吧。张先生也是把玩古董的人物，可是却潜心白话文写作，不像张伯驹那么沉于旧风里，文章呢，在周氏兄弟的传统里，就与时代有了亲密的关系。而张伯驹的话语方式，都带着历史旧影，是自己与古人对话，听的人在小的范围，惟亲近者方可领略一二。这样的人，易被时代大潮淹没，能够意识到那选择的价值，不那么容易。

近来人们发现，研究百年间的文学，旧体诗词的作者，也有相当的价值。虽然形式上是古旧的，但思想未必没有现代性的意味。但研究这类古旧意味的文学，方法则与新文学研究略有不同。这大概与辞章的对应方式有关，总体不在新文学审美的范畴里。像张伯驹这样的文化人，所以在今天颇被知识界重视，一是身上带着现代史里的诸多符号，二是与收藏的藏品品位极高有关。另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有诗人气质，那种钟情传统的精神之光，照出了存在的暗点。时代进化中所遗漏的遗存，并非都没有价值。他所关注、所心系的存在，关乎认识文明史的起落之意，经由其文字看现代史，倒是颇有意义的。

河南有一个张伯驹研究中心，近来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。看作者的队伍，不都是研究新文学的，思路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，新近推出的“张伯驹研究从

书”就包括《张伯驹传》《张伯驹词传》《张伯驹词说》《张伯驹十五讲》《从碧千秋》等，已经形成系列。大规模搜集整理文献资料，是学术研究的基础，而面对研究对象，采取何种视角思考问题，也是一个挑战性的话题。我对于张伯驹没有研究，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其间的经纬。记得当年读到靳飞的《张伯驹年谱》书稿，很是兴奋，了解了许多不知道的旧史。此后世间不断有相关研究出现，说明知识界对于被冷落的文化人，已经有了较为客观的态度。

如何认识像张伯驹这样的人，研究者走的路径往往不一。张伯驹是大的收藏家，对于绘画、戏剧、诗词颇有研究，留下的诗文也颇不寻常。在众多的研究文本里，我比较喜欢以词证史的笔法。冯其庸、靳飞都写过相关的文字。作为活跃的文化人，张伯驹的功绩是震动文物界与梨园界的，但他的不凡之处，还是一位难得的词人。吴祖光说他“在旧体诗词方面的成就达到极高的境界”。那么从其诗词入手，考察生平事迹，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。以词觅史，也会得到一般传说里没有的东西。

“张伯驹研究丛书”中的《张伯驹词传》的写法，就属于类似的一种。作者张恩岭说与文物鉴赏家的身份比，张伯驹的词人身份更为重要。以词的分析方式，来写作者的生平，是进入人物世界的一种方式。这种方式一是适合对象世界的特点，文脉是一体的，二是以审美的角度进入丰富的生活世界，就把张伯驹的艺术家气质点画出来。不过《张伯驹词传》对于文本的研究，还仅仅是初步的，全书的许多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展

开。以词证史，需要做许多的准备和训练。要画好他的像，挑战性也可想而知。

从作品看文人的交往史，是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。有人研究苏东坡，就在字里行间看到背后深的社会危机，文人间的互动，也得以显露。张伯驹生前的好友甚多，可写的故事数不胜数。比如与刘海粟、翁偶虹、王世襄、周汝昌的关系，都有书写的空间，牵涉到文脉的起落。像他与周汝昌的友情，不仅仅涉及红学的佳话，也有词学里的故事。周氏的红学研究，涉及一些几近湮灭的遗存，不料张伯驹的藏品里，有些古迹颇值得琢磨。1948年，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展出曹寅的《棟亭图》，正在研究曹雪芹家族的周汝昌闻讯参观，便与张伯驹相识。后二人多有交往，彼此唱和，留下的文字颇可一观。周汝昌的趣味，与张伯驹很有相似的地方，而张伯驹提供的古代诗画原件，无疑丰富了周汝昌的研究。周汝昌的眼力不凡，于一些地方能够嗅出古风。在与张伯驹多年交往中，就佩服这位朋友的才气和风骨之高。他觉得张伯驹的高处在于词学，所写文字清透、自如，大有幽婉之意。张恩岭注意到了两人交往的趣事，由他们的唱和之句，看文化史的斑斑点点，也不禁引人浮想联翩。
③22

(未完待续)



智慧的彼岸

——老子《道德经》解读

◇ 张君民

人的尊严问题。得宠的以得宠为荣耀，为了不失去荣耀，就会在赐宠者面前唯唯诺诺、诚惶诚恐，甚至曲意逢迎、溜须拍马。宠和辱对人尊严的伤害是一样的，受辱者固然伤了自尊，得宠者又何尝不是在损伤自己的人格尊严？

凡夫俗子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在所难免。宠辱不惊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十分困难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我们都是自然界的匆匆过客，就应该遵循自然规律，无私无欲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踏踏实实做好分内的事。机会来了，搏一把，没有机会，也不必钻窟窿打洞直撞南墙。成功了，那是造化，不成功，那是无缘。不要过分在意得失，不要过分看重成败，不要过分在乎别人的看法。只要自己努力过，只要自己曾经奋斗过，就可以了。

如果一个人不计较任何宠和辱，不为宠辱乱心分神，那么他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傲然而立，保持自己完整独立的人格尊严。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，宠辱不惊、去留无意，方能达观进取，笑看人生。中国佛教学者、居士、中国现代社会活动家赵朴初遗作中写

道：生亦欣然，死亦无憾。花落还开，水流不断。我兮何有，谁欤安息。明月清风，不劳牵挂。这正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的崇高精神境界。

唐太宗时期的卢承庆，担任吏部考功员外郎时，负责考察官员。考察的级别标准，先大体分成上中下。有一次，卢承庆考核一个监督运粮的官员。这个人在运粮时把不少粮食掉进了河里，因此，卢承庆给他定了一个“下”，这个运粮官一点也没生气着急，反而谈笑自若。卢承庆觉得：我给他这么低的评价，他都没生气，说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改个“中”吧。后来，卢承庆得知粮食落水不是运粮官管理不善，而是因为不可抗的大风，把粮船吹翻了。卢承庆认为给运粮官评个“中”也不合适，又改为“上”。这个运粮官还是没有因此而过分高兴。卢承庆对他印象很好，后来在吏部考核的时候，就提拔了他。

卢承庆本人也是一个宠辱不惊的人，最初当过考功员外郎，后来被提拔为尚书左丞，还当过兵部侍郎，由于老说真话，得罪了皇上，获罪被贬去做简州司马。当简州司马的时候，卢承庆

也一点没感觉到窝火。后来，朝廷把他调回朝中当刑部尚书，卢承庆也没有因此特别高兴。病危时，卢承庆嘱托儿女：丧事一定要从简，坟头不要太高，碑文不要乱写，写上我的履历即可。可见，卢承庆不仅清廉，而且是个对宠辱看得非常淡的人。

“贵身”就是贵惜自身，就是要遵循自然法则，远离情欲声色和宠辱等身外之物，清心寡欲，不胡作妄为。只有珍爱自己生命的人，才会珍爱天下人的生命，也就可以使人们放心地将治理天下的重任交给他。
③22

(未完待续)



读书·连载

(接上期)

第十三章

【原文】

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

【译文】

受到宠爱和受到侮辱都好像受到惊恐，把荣辱这样的大患看得与自身生命一样珍贵。什么叫作得宠和受辱都感到惊慌失措？得宠是卑下的，得到宠爱感到格外惊喜，失去宠爱则令人惊惶不安，就叫作得宠和受辱都感到惊恐。什么叫作重视大患像重视自身生命一样？我之所以有大患，是因为我有身体；如果我没有身体，我还会有什么祸患呢？所以，珍爱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治理天下，天下就可以托付于他；爱惜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治理天下，天下就可以依靠他了。

【解读】

本章讲了两个问题，一是论述了对待宠辱的态度，一是强调了“贵身”的思想。对待宠辱的态度，实际上就是